

清宮回憶 (上)

末代皇帝外一章

● 溥 佳

宮中陪伴溥儀讀書

我寫的這篇回憶錄，是從一九一九年我到宮中伴讀時起，到一九二四年溥儀出宮時為止。在這五年中，我的任務雖說僅是陪伴溥儀讀書，却也目睹了宮中的不少事件；現在把它寫出來，目的是給願意了解那時宮廷情況的人們，提供一些感性知識。只因事隔多年，一定會有不少錯誤，希望了解情況的讀者加以糾正。

一九一九年，我到毓慶宮伴讀的時候，清廷雖然早被推翻，民國成立已有八年之久了，但按着民國政府與清室簽訂的所謂「優待條件」的規定，溥儀在宮內仍然保持着他的「皇帝尊號」。因此，這個「小朝廷」對外雖不能再發號施令了，可是在紫禁城內，清王朝時代的一切舊制陳規和窮奢極欲的生活方式，並沒有絲毫改動。紫禁城內外，照舊駐有大批護軍和軍隊，禁嚴氣氛一如往昔。滿、蒙王公和舊臣遺老以及活佛們依舊進進出出，向高踞宮中的溥儀叩頭禮拜，把他拱若神明。即使是北洋政府的一些高官顯宦和封疆大吏也總以得到「皇帝」的青睞為榮。每逢婚喪

嫁娶，光弄到大總統的匾額還不過癮，總要設法讓溥儀也「賜」給一塊，才覺得體面。當時，有位翰林把李白咏「上皇西巡南京歌」中的兩句改為：「少帝清宮開紫極，雙懸日月照乾坤」，却也反映了當時的這種怪現狀。（原文是：「少帝長安開紫極，雙懸日月照乾坤」）

我在毓慶宮是伴溥儀讀英文的。溥儀要學英文，首先是由李鴻章的第四子李經邁向我父親載瀾建議的。他認為，自張勳復辟失敗以後，形勢對於清室日益不利，恐溥儀不能久居宮中。應當趁此苟安時機，讓溥儀學習英文和一些新的知識，日後一旦有變，或出國留學，或到海外作寓公，都是極為有益的。我父親對李經邁的這個建議十分重視，因為他們早就有往來，我父親到歐洲考察陸軍時，李曾作過他的首席隨員。辛亥革命後，李匿居上海租界內，每年還總要到北京來一次，一來就到我父親處盤桓數日。因此，我父親就把李的這個建議向我五伯載灃（溥儀之父）以及陳寶琛、朱益藩（溥儀的兩位漢文師傅）提出；其間自然免不了遇到一些曲曲折折，但最後總算都同意了。太妃方面，也費了許多唇舌，後來

雖未表示贊成，但也沒加反對。於是，就把聘請英文師傅這件事交給我父親來辦理。

自辛亥革命以後，我父親為避免北洋政府的注意，很少和國人來往，就請李經邁代為介紹。李由於他父親李鴻章的關係，自清末以來就和帝國主義，尤其是英帝國主義上層分子的關係極為密切；又因他精通英語，清廷每次向英國借款，都由他從中磋商。據說，每次借外債他所得的回扣，都在百萬兩以上，因此家資豪富。他家不但備有汽車數輛，還備有專用的輪船、汽艇。李經邁受我父親之托，果然很快就請到了莊士敦作溥儀的英文師傅。

帝師是個洋書呆子

莊士敦是英國蘇格蘭人。他在牛津大學讀書的時候，就專門研究東方古典文學和歷史，畢業後先被派到香港任英國總督的私人秘書，後又被派到山東任威海衛殖民地行政長官。最初他只能講廣東話，到威海衛後北京的官話也說得很流利了。他曾經對我說過，他在青年時期就研究過中國的古典文學，到中國以後又讀了不少佛家釋典

感到東方的佛教理論要比基督教的聖經不知高深多少倍，從此對基督教非常鄙視，也不到教堂作禮拜了。他寫過一本書，名為「大地衆生成佛」；還和英國一個神父經常通信，用佛教理論來駁斥聖經，後來也把他們的來往信札輯錄成書。

他爲了研究佛家釋典，曾到過我國不少名山古剎，向那些法師高僧探討釋典的妙諦。在政治方面，他還寫了一本「威海衛」，我現在還存有一本。從這本書裏，可以看出英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情況和他對殖民地的看法。不過這與本文無關，不再多敘。

莊士敦於一九一八年夏天來到北京，首先拜訪了我父親。當時，我們家裏很少有外國人來訪，我和弟、妹都偷偷地跑到客廳外邊來看。恰巧，我父親正同莊士敦從客廳出來，莊士敦把我叫到跟前，問了我幾句話，就對我父親說：「我每大下午到宮裏教英文，上午一個人在家也沒有事，就叫他上午到我家學英文吧。」臨走，還一再叮囑我一定天天去，大概這也是向我父親表示酬謝的意思吧。從此我每天上午就到安定門外張旺胡同莊士敦的家裏去學英文了。

和莊士敦接觸多了，我便逐漸感到他是一個性情非常孤僻的人。他住着一所三十多個房間的大宅院，但除了一個管事的和看門的，就再也沒有別人了。他曾對我說：「我是一個獨身主義者。按照我們歐洲人的習慣，結婚以後，就得殷勤地伺候妻子，一切行動都要受她的約束，實在麻煩。我現在有了這些書籍，它們就是我的妻子，能和我作無聲地談話，我也不必伺候它。」他所

收藏的古今中外的書籍號稱萬卷。在他住的那五間大廳裏，擺的全是由地板到頂棚的大書架。我看沒有萬卷，也有五、六千卷。無論我什麼時候到他那裏，總是看見他坐在那張特製的書桌旁讀書。

莊士敦對中國封建官僚的派頭極爲欣賞。他在家裏或是拜訪王公舊臣時，總願意人家稱他「莊大人」。他的名片上用中文印着「莊士敦」，下面還印上「志道」。這是他的別號，非常喜歡人家稱他「志道先生」。他每次和陳寶琛、朱益藩以及王公舊臣見面，也總愛學中國官場的樣子，拱手爲禮。

莊士敦對我們管教很嚴，凡是他不願意做的事，從不教我們做；他不願意見的人，也不叫我們去見。我記得一九二九年二月，莊士敦和我父子二人到上海看李經邁時，猶太人大資本家哈同夫婦請我們吃飯。莊士敦對猶太人本來就有些輕視，及看到哈同的妻子羅迦陵（廣東人）那種傲慢的態度，以及管事人滿手的鑽石戒指，便說成是有意識地向他誇富，於是就用極其尖刻的語言來笑罵他們；哈同的妻子也反唇相譏，莊士敦就一怒而去。從此也不許我同他們往來了。我父親常說，莊士敦是一個外國「書呆子」。

到了一九一九年春天，宮內傳出消息，要在近支王公子弟中挑選一個伴讀英文的。所謂「近支」子弟，就是皇帝的直系子孫。因同治、光緒兩個皇帝都沒有兒子，我和溥杰就是與溥儀最近的王公子弟了，（溥儀、溥杰爲兄弟，溥佳與溥儀爲堂兄弟。）因此成了「競選」的主要對象。

按照親疏和年齡而論，當然溥杰更爲適當，可是把他的名字提上去以後，莊士敦却不同意。理由是我的英文已有相當基礎，而溥杰必須從頭學起，他感到太麻煩。爲此，我五伯對我父親還產生了誤會，以爲是我們托了莊士敦的人情了。這樣僵持了多日，最後還是尊重了這位外國「帝師」的意見，我被「榮選」爲溥儀的英文伴讀。但爲了敷衍一下我五伯的面子，又挑選溥杰作了漢文伴讀。

扮演謝恩汗流浹背

溥儀爲酬謝莊士敦教他英文，下了一道「上諭」，賞他「頭品頂戴、毓慶宮行走、紫禁城內賞乘二人肩輿（即二人抬的一種小亮轎）」，月俸是銀元一千元。我被挑選爲伴讀後，溥儀也下了一道「上諭」，派在「內廷行走，伴讀英文，賞在紫禁城內騎馬」；另外，每月還賞月例八十兩（一百餘銀元）。我父親接到這道「上諭」，立刻教給我朝見皇上的禮節，次日便帶着我進宮去「謝恩」。一路上，我看見那些護軍們一個個那樣威嚴可怖，以及太監們那種誠惶誠恐的樣子，心裏跳得發慌。父親領我先到尚書房，又到奏事處，不知經過了多少道手續，才到了養心殿朝見溥儀。我們側身進入殿內，先向他請了一個跪安，接着又跪下，我父親便說：「奴才帶領溥佳叩謝皇上天恩！」然後這才把官帽摘下放在地上，以頭觸地，叩了三個頭。溥儀那天穿的是袍褂，端坐在東暖閣的寶座上。我在恍惚之間，似乎聽溥儀說了聲「伊力」（滿語，起來的意思），

我們才帶好官帽，側身退出來。之後，父親又帶着我分別到四位太妃那裏去謝恩。待到這場「謝恩」戲表演結束時，我已汗流浹背了。

自我被「榮選」爲伴讀後，祖母等都說我有「造化」，親友們紛紛前來道喜。其實，我看了宮裏那些繁瑣的禮節，森嚴的氣氛以後，總覺得那樣念書，確實和受罪沒有什麼兩樣；但是「君父之命」，是不可違抗的，過了幾天，我就「走馬上任」了。

溥儀讀書的地方是在毓慶宮的西間，裏邊沒有什麼珍貴的陳設，擺的盡是書籍，靠北牆有一個大鐘錶，高度幾乎與那牆相等。宮內有專門伺候溥儀讀書的太監，還有伺候師傅的坦達（滿語）、太監和匠役四、五人。他們除伺候師傅們的茶飯等雜役外，幾名匠役還得管理溥儀和師傅們的書寫事務。這些匠役不光有較高的文化水平，而且擅長書法，凡溥儀賞人匾額或對聯時，一般是師傅先把攥好的詞句寫在紙上，再由匠役們按筆劃用針刺成小孔，撒上白粉；白粉漏在另一張紙上，溥儀就照那白粉的字形來描寫。有時他認爲是不甚重要的人物，就乾脆全叫匠役們代筆。反正印上他那顆「宣統御筆之寶」的「璽」，受賞者也就心滿意足了。

溥儀每天下午到遠毓慶宮的時間都很準確。

頭一、二年，他從養心殿到毓慶宮都是坐轎子；轎的圍墊都用明黃緞子製成。明黃色是皇帝專用的顏色，其他任何人都不得妄用，否則就是「大逆不道」。就連后、妃也只能用杏黃色。在溥儀轎前大約六、七十米的地方，有一個太監一路走

，一路用嘴發出「味、味」的聲音，叫做「打吃」。那時，只要一聽到這種聲音，凡在屋裏的人都要停止說笑，在外邊的人都要急忙躲藏起來；實在躲藏不及的，就得面向牆壁而立，以免「驚駕」。轎子前後，還有不少太監，有的負責護衛，有的挑着圓籠，內置茶水、點心等東西。

我每天進宮，都必須穿長袍馬褂、戴官帽、穿靴子，腰間繫上一根黃帶子。那時在宮內當差的都留着長辮子，因我從來就沒有留過辮子，我父親就給我買了一條辮子，掛在官帽上，害得我老是耽心它掉下來。

我第一次進宮伴讀那天，是和莊士敦一起去的。御前太監把我們引到毓慶宮，只見溥儀穿長袍馬褂，腦後拖着一條長長的辮子，站在八仙桌前，等莊士敦向他行過鞠躬禮後，他才坐下。據說，這就是皇帝的尊師之禮了。可是我每天見他，總得給他請跪安，然後才坐在八仙桌旁開始讀書。我與溥儀相對而坐，莊士敦坐在中間。我偷偷一抬眼，就看見溥儀那張沒有一絲笑容的臉，我坐在那裏就如同坐在針氈上一樣難受，幾乎連ABC都忘記了。心裏只是盼着趕快下學，好容易盼到下學的時間，我就像野鳥出籠一樣奔回家去了。

英語會話勝蒂一籌

這種枯燥無味的讀書方式，持續了將近一年之久，連莊士敦也想到很不好受了。爲了使氣氛輕鬆一些，他幾次讓我跟溥儀說些笑話；可我惶恐猶不暇，哪裏還敢同他說笑話呢！莊士敦無辭

，只好自己講一些外國故事和笑話，這樣我倆才慢慢所熟起來，我也敢和他說笑了。有一次，溥儀趁老師不注意，偷偷地用鉛筆給我畫了一張速寫相，把我的臉畫得圓圓的，遞給我，我也把他畫成一個上寬下窄的長臉，偷空送給他。溥儀的速寫確實不錯，我還曾收集過一百多張。還有一次，我倆用腳在桌子下面打起來，開始莊士敦還不理會；漸漸打得激烈了，他不好對溥儀怎麼樣，就向我怒目而視，我們這才暫告「停戰」。

莊士敦認爲光教我們英文單字和會話，過於淺顯，因而在我們讀完「英文法程」初集後，就開始教我們讀「伊索寓言」、「金河王」、「愛麗斯漫遊奇遇記」，以及許多英文短篇故事和西洋歷史、地理等。後來，又開始要我們用英文翻譯「官話匯編」，沒翻譯一半，又改爲翻譯四書。莊士敦教我們讀其他的書，往往沒讀完就又換新的書了；惟有對四書，他最喜歡，讀的時間也最長。可是對於我來說，讀這種書簡直和受罪一樣。

我們每隔兩天就翻譯一回四書，每次都是溥儀先譯前一段，我再譯下一段。溥儀古文基礎較好，還能勉強譯出來；輪到我譯時，除了把「子曰」譯成「Confucius said」之外，其他的就誰也看不懂了。因爲我在家裏雖也讀過四書，而且能夠學唱歌兒一樣地背出來，但對其中的意思總是茫然。記得我每次把譯文送給師傅時，莊士敦氣得總是紅着臉，怨沖沖地給我修改。本來，這已使我够窘的了，可溥儀的臉上却還流露出得意和訕笑的神氣，簡直急得我要哭出來。莊士敦把這

些情況告訴了我父親；我父親就給我想了個辦法，就是請王府的老師把古文譯成白話，然後再交給我譯成英文。溥儀的筆譯雖比我強，可是在英語會話方面，他就不如我了。因為我除了在宮中學習外，莊士敦還叫我到他家裏去學，並且不准用漢語同他講話；他還經常帶着我到外國使館和他的朋友家裏，參加宴會、茶話會等。這樣，我說英語的機會比溥儀多，所以在會話方面就比他略勝一籌了。

按照宮內的規矩，每月逢二放假休息，春節放假十天。節後開學，溥儀照例賞給師傅、伴讀每人一套殿版書、一匣極為精緻的古墨。端午、中秋兩節，由懋勤殿出名，請我們吃一頓豐盛的酒席。夏天由初伏到末伏放假一個月，照例賞給每人祛暑藥兩匣、乾隆貢扇一把。冬至節前，每人賞一幅「九九消寒圖」，一塊宮內自製的硃砂墨。這幅消寒圖有由九字組成的題詞：「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」，據說是乾隆之作。每個字都用紅筆雙鉤下來，裝在木框裏，裱工極為精細。因每個字都是九劃，從一九開始每日描寫一筆，到九九八十一天正好描完。有的人還在每個字的筆劃中，用朱筆勾出晴、陰、雪等日的天氣。從一九二〇年起，莊士敦每年夏季都要去京西櫻桃溝避暑。這塊地方是內務府的官產，只是撥給他使用。莊士敦除在這個風景優美的山溝蓋了一所住宅外，還修了一座小廟，取名為「五柳先生祠」。裏邊供着數十個牌位，其中除了五柳先生陶潛外；還有李白、杜甫、蘇軾等我國著名的詩人和文學家，以及外國的荷馬、莎士比亞。莊士敦說，

這些都是他所欽慕的中、外名人，每天燒香供茶。那時，因我在那裏住了十幾天，故略知其詳。

大好時光白白浪費

一九二二年溥儀大婚之後，每天下午，在神武門內又增加了兩乘二人肩輿。一乘是教溥儀之妻學英文的師盈女士（美國人，美以美會一個牧師的女兒）所坐，一個是教溥儀之妾的英文女教師（美國人，名字已忘）所坐。表面看來，他們學英文的興趣頗濃，實則大部分時間都花在玩樂上了。

我在宮中伴讀了五年，直到一九二四年溥儀被驅逐出宮，準備考中學的時候，才發現自己除了英文以外，其他課程都必須從頭學起。在這五年中，我受到了只有親、郡王或一品大員才能得到的種種「殊遇」，但是對於我的學業來說，大好時光就這樣白白地消磨過去了。

乾清門內太監充斥

清代宮中的祖宗家法雖然嚴厲，但由於我在那裏伴讀的時間長了，就和溥儀以及他的漢文件讀溥杰、毓崇逐漸熟識起來；溥儀也時常叫我們到他所居住的養心殿去玩，有時甚至還在一起打鬧。因此，對於那時宮廷的生活也漸漸地了解了。

清代的王府一向是競相奢華的，可是要與宮裏比起來，即使以我這個王公子弟的眼光來看，那也不要差多少倍了。

一走進溥儀居住的養心殿（清朝歷代皇帝都

住在這裏），我就想到那氣魄確非一般王公府第所能比擬。從表面上看，殿內的陳設雖然不多，但一應家具，諸如几案、桌椅、櫥櫃等盡是由紫檀等珍貴木材製成；一色淡黃色宮緞所做的墊褥鋪陳其上。隨着節令的變化，還要隨時更換，如夏天用葛布、夏布、冬季換上水獺、貂皮、海龍皮。在東暖閣的南窗與炕桌上，擺着兩件唐代瓷器，記得溥儀告訴我，像這樣的瓷器，就是在整個宮廷裏也為數不多，真是稀世之珍。東北角還擺着一個刀架，架上插着一把刀。據說這是一把「寶刀」，當年康熙皇帝出征時曾經佩帶過，刀上至今還遺留着血跡。至於殿中陳設的玉器、瓷器和書畫等等，那就更多了。但我們最喜歡的還是那些帶機器的玩意兒，如大八音盒和假鳥等。鳥籠全是用金絲編織而成，鳥兒也都是用黃金做的，上面塗以各種顏色，簡直與真鳥無異。把發條上好以後，懸掛於殿廊之上，登時便會眾鳥齊鳴，悠揚宛轉，展翅搖翎，真令人有栩栩如生之感。

宮裏除了有這麼多珍寶供溥儀玩賞之外，還有許多太監供他役使。只要過了乾清門，進入所謂「內廷」，簡直就像到了「太監世界」。據我所知，這時清宮儘管是太監最少的時候，但仍有八、九百名之多。這些太監，除了有四百餘名伺候四位太妃以外，其餘都是直接或間接供溥儀驅使的。光養心殿一處，就有一百餘名太監來照料他的日常生活。太監之中，地位最高的是「督領侍」張德安，二品頂帶，我們都稱他為「諸達」（諧語），溥儀對他也比較客氣。他平時只是偶

爾到養心殿來問一問溥儀的生活情況，實際管理養心殿事務的太監，是大總管阮進壽，花翎二品頂帶，派頭很大；他出入宮內，也跟着幾個太監專門伺候他。在溥儀身邊伺候的太監叫「御前太監」，大約有五十多人，都是從太監中挑選的一些年青、伶俐而又熟悉禮教的太監來充當的。他們穿的是綾羅綢緞，待遇也較高。另有幾十名叫「殿上的」，穿的都是布衣布靴，只能在殿外聽候御前太監的吩咐。我看見每逢開飯時，溥儀吩咐一聲「傳膳」，御前太監就照樣向殿外高喊一聲，殿上的太監便趕忙一聲「喳」！真是堂上一呼，階下百諾。上菜時，「殿上的」把菜飯送到東暖閣門外，然後再由御前太監擺到桌上，沒有溥儀的吩咐，他們是不能隨便進入東暖閣的。太監們見溥儀時，必須先向溥儀「打扞」，即右腿下屈，雙手搭在左膝上；見畢仍須打扞，才能側身而退。他們對溥儀連「皇上」也不敢稱呼，只能呼「萬歲爺」或「老爺子」。我初到宮內時，看了這些感到很奇怪，其實這不過是歷代封建統治者爲了保持自己「至高無上」的地位，所採取的一種手段罷了。

每餐吃喝窮奢極欲

宮內的飲食也到達了窮奢極欲的程度。我初到養心殿時，溥儀曾叫我同他一起吃飯，宮中叫「同桌」。這也是皇帝對臣下一種了不起的「殊遇」，按規矩是要叩頭謝恩的，不過溥儀嫌麻煩，以後就免了。溥儀用飯是在東暖閣，每餐的飯菜，總要擺三、四張八仙桌。據說，皇帝每餐都

有定制，辛亥革命後已有所削減，但菜還是有六、七十種之多。這些都是御膳房做的，另外還有四位太妃送來的二十幾種精緻的家常菜。米飯有三、四種，小菜有十幾種，粥有五、六種。在宮內流傳着這樣一句話：「吃一看二眼觀三」，大概就是形容飯菜多的意思。實際上也正是這樣，盡管擺了這麼多飯菜，但溥儀只是吃他面前的幾樣而已。後來，溥儀對這樣豪華的「御膳」，也許是吃膩了，又經過朱益藩的介紹，把北京忠信堂的著名廚師鄭大水叫到宮中給他做福建菜。

水車夜夜載送玉泉

溥儀飲用的水，是每天遠從西郊玉泉山運來的「玉泉水」。我每天下午下學，總要見到一輛毛驢拉的水車，上面插着一面小黃旗，慢慢地進入神武門內。據宮內的老太監們說，這輛水車還是乾隆時遺留下來的。當年，乾隆皇帝曾把北京市郊的泉水、井水全嚐遍，並用稱計量了水的輕重。最後，以玉泉山的水既甘而重，被評爲第一。

因此，後來皇帝們每天的用水，都要從玉泉山運來，直到溥儀出宮以前都是如此。老太監們還說，在辛亥革命以前，這輛插着黃旗的水車夜間通過西直門時，城門必須特別爲它啓閉（從清朝至民國十三年前後，北京各城門每晚十時關閉），並且要走在馬路中央，就是王公大臣見了，也得給它讓路，誰也不敢碰它一碰。辛亥革命以後，這輛車雖然不像當年那樣「威風」了，可每到夜間，西直門還得專爲它啓閉。最可笑的是，

軍閥內戰的時候，各城門關閉甚嚴，除了軍人和外國人，任何人不得出入，而這輛插着黃旗的水車，照舊通行無阻。有人嘲笑它是一輛「外國水車」。

宮裏設太醫院，是專爲皇上和后妃們看病的。太醫院的醫生稱爲「太醫」，我經常看見溥儀叫太醫來給他診脈。起初，我還真以爲他病了，後來我才知道，沒有病也可以叫太醫來診脈，這叫做「請平安脈」。太醫給溥儀診脈時，還得跪在地上，診畢即使沒病，也要開一個藥方，叫做「代茶引」。至於溥儀是否服用，那就不得而知了。（未完待續）

敬告留學生家長

慰藉 貴子女異鄉作客寂寞的最佳禮品，便是爲他們訂份「中外雜誌」。請將貴子女在國外詳細地址填妥，連同全年十二期訂費新臺幣壹仟肆佰伍拾元（折合美金伍拾元連郵費在內）交郵政劃撥〇〇一四〇四四一四號，本社立即按址按期寄上本雜誌，省時、更省事。